

陈鸣树 著

鲁迅论集



复旦大学出版社



鲁迅

陈鸣树

论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论集 / 陈鸣树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 7- 309- 07746- 9

I. 鲁… II. 陈… III. 鲁迅著作—研究—文集 IV. I210. 9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0245 号

鲁迅论集

陈鸣树 著

责任编辑/杜荣根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47.75 字数 720 千

2011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7- 309- 07746- 9/I • 580

定价: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我与鲁迅的因缘(代序)

陈鸣树

鲁迅在1936年逝世那年,我仅仅六岁。我现在已记不清从什么报纸上剪下了一张鲁迅先生出殡时的画像,我用硬纸板复在后面,放在我卧床旁桌上好久好久,也许就因为那画像旁缀有“中国文坛巨子”的字样,使我早熟的心灵有了朦胧的感应。十几岁时,我曾在旧家的书箱里找到一本刊有《孔乙己》的《新青年》,算是我第一次接触鲁迅的作品,虽然当时我并不能领会其中的深意。

我早年丧父,因家贫中途被迫辍学,走过一段寂寞悲苦的人生之旅。我在第一本书的《后记》中说:“我真正接触到鲁迅先生,并不是在学校,而是在作坊里、柜台中。应该属于较为遥远的往事了,记得解放前当学徒的时候,不知怎样从一个老工人那里得到一本《鲁迅自选集》,从此它成为我寒伧的行囊中的瑰宝,在寂寞悲苦的生涯中,它给我精神上的补养。我当时不能尽解地读着,特别使我至今不能忘怀的,是对《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的印象。‘夜正长,路也正长’,那沉痛的抒情的结尾,是怎样一再唤起我慷慨激越的情愫,从此我就觉得自己已经告别了毫不值得留恋的童年。”

1949年9月我参加工作,作为一颗螺丝钉被拧在革命的机器上,曾在苏州公安局等部门服务。不几年,因病在市府机关干部疗养所休养,我广泛阅读了许多文学书籍,其中读得最多的是鲁迅,我几乎读遍了《鲁迅全集》。

当时,我有幸认识了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朱彤先生,他原来是攻读历史的,刚从美国归来。他曾写过和演过话剧,因此,讲课时感情投入,效果

极好，常常虽是大教室而学生爆满。他是我第一位私淑的老师，受益匪浅。但是，他也不能超越时代的局限。当时，第一要学习马列主义，第二要用马列主义批判一切旧事物、旧观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我们都牢牢记住这句话。既然要批判，就要找靶子。我就找了一本许杰先生的《鲁迅小说讲话》，给它扣上了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帽子。朱彤先生建议我投到《人民日报》去，我有些胆怯。因为当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的都是一些大干部。真巧，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了出来。后来知道这是李希凡处理的稿子。后来，我又在上海《文艺月报》上发表了类似的一篇篇幅更长的文章。似乎奠定了我在鲁迅研究领域内初战告捷的地位。我当时还不能理解我的胜利的喜悅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的。本来，学术上的论争是正常的事，但那时一切都被纳入政治的范畴内，文学上失利的一方同时是政治上失利的一方，这是非同小可的。现在想来，我不能不受到良心的谴责。

当时，正好一位大人物提出要在各地发现“新生力量”，我也被当地（苏州）凑数凑上了。从此，就被一股“左”的思潮所误导。

我被指定为“新生力量”后，先是受到中宣部领导的垂访，最近，黎之先生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了一系列的回忆文章，其中便提到他随林默涵等到苏州专门接见了陆文夫、我和滕凤章三人，陪同接见的有苏州市委宣传部部长凡一、文化局长钱瓔（阿英的女儿）。从此，我被调到苏州文联，任执行委员兼秘书，成了江苏省文联委员，华东作家协会会员（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参加了全国第一次青年创作会议，聆取了周恩来、胡耀邦同志的报告。其中写小说的如王蒙、陆文夫等后来都成了著名之士。理论组参加者约七八人，组长陈涌、副组长李希凡，在此以前，我与这两位都有过通信交往。参加了上海作协，唐弢先生曾专门邀请我到他所住的茂名公寓寓所便饭，我非常惊叹他的藏书之多。由于他也是自学出身，并已能从事英文翻译，这使我十分佩服，我便自许为他的私淑弟子，一直到他逝世。当时我的工作已调到江苏省《雨花》编辑部，负责理论组，我记得曾约过吴小石、陈瘦竹、朱彤等先生的文章。但做编辑非我所愿。这时《光明日报》正好刊登南开大学中文系李何林教授招收副博士研究生的广告，研究方向为鲁迅研究。我颇想一试，就报了名，在南京大学应试。不久，我便成了李何林教授第一届的研究生，我们这一届连我共四人，吴火系天津公安局外事处长，属十三级高干之列；刘家鸣原是南开助教，后来他写过《鲁迅小说的艺术》一书；胡

炳光毕业后在石家庄河北大学工作，曾在《文艺报》上发表过《论〈野草〉》的论文。四人之中，以我原来的学历为最低，仅读过初中三年级。李先生对我说，你没有读过大学，要补补课。因此凡大学生读过的课，我都去补听。他又对我说：你要抚养母亲，助学金（近60元）恐不够，你可以多写点文章。当时，因为我发表过一些批评鲁迅研究领域内的论文，驾轻就熟，我想何不就所有鲁迅研究界的对象都来批判一番。这便是我在就读研究生期间所写的第一本著作《保卫鲁迅的战斗传统》，其中除《论鲁迅的初期美学思想》[其中所提出的鲁迅小说的源头是从浪漫主义开始的，鲁迅的《斯巴达之魂》是一篇“浪漫主义传奇”的观点，就为前苏联莫斯科大学东亚学院院长谢曼诺夫教授所称引，写在他的专著《鲁迅和他的前驱》（中译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中]、《鲁迅与拜伦》（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论鲁迅的抒情散文——关于〈野草〉和〈朝花夕拾〉》外，大部分都是批判鲁迅研究界的代表人物。当然，有的是我主动的，有的为了凑数，有的乃是被纠缠进上层的一种“政治斗争”中去，自己成为炮弹。如周扬曾示意叶以群要批判冯雪峰，叶以群派了专人到南开大学找我赶写了《一个个人主义心目中的鲁迅——批判冯雪峰的〈回忆鲁迅〉》。后来此文很快就上海登了出来。这些文章，至今想来还十分内疚和汗颜，对为我涉及的前贤和时贤表示深深的歉意。可是在当时却为我赢得了当地省市宣传部领导和校方的重视，使我变成了一个恩宠有加的特殊学生；嗣后，在上海文研所工作，主要是给上级写汇报，汇报哪里有什么“风起于青萍之末”的动向。其间，在《上海文学》连载三期发表的《论鲁迅小说的艺术方法及其演变》，承当时沦落在我所的王元化先生颇为赞赏，并推荐给正要筹拍《鲁迅传》的名演员赵丹看了。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理论室周天先生也写信鼓励，希望我在此基础上写成一本书。其实，在这段日子里，我很少有时间系统研究鲁迅，日子都打发在怅惘和空虚里了。

由此，进入了革命文化自我消解的“文革”，我在大潮裹挟下，也写过《鲁迅的批儒反孔斗争》的小册子，毫无疑问，是层层指使下迎上的产物。当时，我在上海作家协会的上海文学研究所，其中有以巴金为首的文坛巨擘一大群，因此，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就幸免于难了。设若我是中学教师，就在劫难逃了，被弄成“权威”来批斗也是可能的。

大约在1975年，周海婴给毛主席的信批下来了。经当时的政治局讨

论,决定按“最高指示”成立中央级的鲁迅研究室,开办费20万元,还买了两辆上海牌轿车,隶属王冶秋为局长的文物局。研究室主任是刚“解放”的南开大学李何林教授,也是我的恩师,副主任是北大王瑶教授、《人民日报》的姜德明同志。其中还有陈漱渝、王德厚、金涛、李伟江、姚锡佩和我等,好像我们都上了政治局讨论文件上的名单的,因此,一律由中组部调配。当时,我正在上海作家协会看大门,工宣队一听中组部要调我,包括我们的上级上海市文化局都对我十分礼遇。其时,作协已经“砸烂”,借调到北京,他们问我上海的人事关系放在什么单位?要不要在文化局?我想我此去是鲁迅研究室,上海与此对口的单位只有鲁迅纪念馆,且纪念馆有大人物的保护伞,肯定比较稳固。因此,我北上之后,月月都在上海鲁迅纪念馆领工资,一直到我从1977年底调到复旦大学。我很惭愧我在纪念馆领了几年干薪,毫无贡献,当我后来调回上海,人事关系由该馆转到复旦时,他们党政领导大度地批准了我的申请。因此,我嗣后在鲁迅研究和教学中所获得的微薄的成绩,上海鲁迅纪念馆使我永志不忘。

我在李何林主任领导的中央鲁迅研究室,为年谱组召集人,主要分管年谱编写工作。这是该室的重要项目之一。当时,我非常没有经验,平常掌握资料也不多。我记得由李何林主任带领,去拜访过近代史专家刘大年学部委员一次。又联合了北京师院中文系的潘德延同志等。当时,北大王瑶教授也来了,每次由我到北大镜春园寓所去接他。王先生健谈而诙谐,才华横溢。我追随他半年,实在得益匪浅。例如他说写文章不能像乱柴一捆,要把相似的素材、论点一扎一扎捆起来,每扎之间要有联系。在此之前,我也曾拜访过王先生几次,他请我喝“竹叶青”,借酒长谈,言多涉及时政,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统治,都认为必不能久。在北京期间,陈涌同志也来看过我一次,我因为曾批判过他,讪讪地颇感不好意思。他似乎早已淡忘,且一见如故。我请他吃了个苹果,送到他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集体宿舍里。我曾盛赞他当年所写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当时都作为教材的。他说:“一个人一生中如果只有一篇文章被人记起,这是一种悲哀。”这话对我震动很大,一直作为我的座右铭。在北京期间,经历了普天同庆的“四人帮”的粉碎。宋振庭主持的《社会科学战线》创刊,我应邀写了一篇题为《论鲁迅小说的典型化》,四万字分两期发出。自此,总算复归到鲁迅研究的正路。

那时我刚从北京调到复旦大学,先在历史系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工作,在

这里扩展了我的视野。但这些课题的庞大容量使我中文系出身的人感到力不胜任。我得感谢当时我校党委书记夏征农同志,他建议在中文系成立一个鲁迅研究室,后改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室,我在那里当主任一直到退休。回到老本行,虽不能说驾轻就熟,但究竟知道如何努力。在复旦历史系写的第一篇文章:《论鲁迅“五四”时期的思想》,为的要与我当时所做的工作——思想史靠拢。到中文系后,我奉献的第一本鲁迅研究著作是《鲁迅小说论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我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

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7篇论文,意在从不同角度对鲁迅小说作一些综合性的探讨。第一篇《论鲁迅的思想特点和小说创作》就是从哲学、思想史的角度出发的;第二篇《论鲁迅小说与中国民主革命》则有意识地从史学、近代史的角度加以考察;第三篇《论鲁迅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已如篇名所示,则从文学史的角度研究。从第四篇至第七篇,依次分别为谈他小说的艺术方法、典型化、艺术辩证法、风格、语言等,这应该属于美学、语言学的领域。想由此构成一个小小的系统。

这些文章大都写在近两三年,只有一篇《论鲁迅小说的艺术方法及其演变》,是为纪念鲁迅诞辰80周年、逝世25周年而作,在1961年发表过。因此笔调还带有一些青年时代的抒情气质,嗣后,这样的青春便埋葬在十年浩劫中了。当时这篇文章曾得到研究鲁迅的前辈专家的鼓励,但是,20年过去了,却毫无长进。如果一个人大半生中,只有一二篇文章被人记起,这原是一件悲哀的事,我希望这悲哀不致伴随着我的一生。

书名《论稿》者,一以草创,都不成熟;一以警策自己。

这里所提到的《论鲁迅的艺术方法及其演变》,上文已述。序中有些悲观情绪,显然受到陈涌先生的影响。在这前后,王元化先生曾提到鲁迅研究中的综合研究法,颇得我心。我这本书可说综合研究法的一种尝试。

《鲁迅小说论稿》出版后,颇承学界奖掖,被认为是综合研究的一种新的收获。《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曾发表了腾云的万字长文评论,承加以溢美:“全书不到二十万言,显得紧凑,扎实,水分无多。它相当全面地触及了鲁迅小说的各个方面,自成系统,而且在体系上兼得论文之深与专著之长。”“这本书所涉及的范围,虽然前人与时人不断涉足,但作者却是在作独立研

究,有自己的角度,有自己的分析,有自己的概括,他的挖掘更深入,他的立论更严密,他的方法和文思更有新意。在开发甚早的鲁迅小说研究领域,能做到有所出新,诚非易事。”

我在起步甚早的鲁迅领域,走了一圈弯路,终于取得学界的谅解和定评,对我诚属莫大的慰藉。

1982年问世的《鲁迅杂文札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本来是《鲁迅杂文研究》的先期工程,是遵照李何林导师的指示分析了鲁迅近70篇杂文的札记。李何林教授十分重视鲁迅著作的普及工作,认为对鲁迅的著作先要读懂。这“札记”,实际是一种导读。但书前附有《略论鲁迅杂文》的《代序》,指出:鲁迅的杂文“凝聚了他那个时代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斗争经验。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借着鲁迅的杂文,去了解他那个时代,并将由此懂得中国的今天和明天还该做些什么。”我在这篇《代序》中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鲁迅杂文如下的特点:一、总结了人生斗争的经验;二、映照出“时代的眉目”;三、描述了社会风貌和心理特征;四、参与了文化思想论争。并指出:“鲁迅将中国的散文艺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第一,它发扬了中国古典散文的战斗传统;第二,它将议论性散文与抒情性散文熔于一炉;第三,它特别注意到了中国散文中一个不大被人涉及的领域——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第四,它运用了形象性的描绘;第五,特别注意了杂文的史笔,将历史的追溯与现实的剖析结合在一起;第六,喜剧色彩、抒情色彩与议论风生相结合;第七,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如随感录、短评、史论、人物论、漫笔、日记、书信、絮语、对话、后记、题跋等等;第八,在语言上有很多新的创造,如庄谐并用,文白相杂、风格摹拟等等。”当然,这些概括,还不免皮相,如果天假以年,我想完成一部真正的《鲁迅杂文研究》。

1984年,我出版了鲁迅研究论文集《鲁迅的思想和艺术》,在所收15篇论文中,只有2篇写于50年代中期,1篇写于60年代初期,其余的论文,都作于新时期。其中,《论鲁迅的辩证法思想》(研究提纲)、《论国民性问题的在鲁迅思想中的地位》、《论鲁迅的审美特点及其对创作的影响》都较为重要,代表了我这一时期的学术水平。即使涉及《狂人日记》、《阿Q正传》这样的论文,我也都提出了自己独立的看法。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我回顾了鲁迅研究中所走过的弯路,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回忆我开始动笔,尚在50年代中期,那时还是一个不更事的青年,

如今却两鬓霜染，而成绩寥寥，且其间认识不无迂执，写的东西有的也早成明日黄花，思之不能无慨！差堪自慰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对鲁迅先生的钦佩，却有增无已！

这里显然也表达了我在青年时期误从“左”的思潮的反省和追悔。

在鲁迅研究领域中，我是幸福的。唐弢、陈涌、李何林、王瑶几乎都成了我的老师，过从甚密。当然，李先生是名正言顺的业师。他为人方正，治学严谨，在原则问题上不管对方地位多高都寸步不让，使我衷心折服。在他 80 华诞，我写过一篇《李何林教授对鲁迅研究的贡献》，其中说：“先生首先作为一位革命者来认识、评价和阐扬鲁迅的，因此，他十分强调鲁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鲁迅在与各种错误倾向论争中的正确立场，鲁迅刚正不阿的‘硬骨头’精神；先生十分强调鲁迅研究应该注意普及，包括对鲁迅著作的思想和艺术的详尽的解释和阐发，目的是希望鲁迅的思想文化遗产能够为青年所理解，成为振兴中华的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并垂之久远。这是先生的鲁迅研究的基本特色。”（《李何林纪念集》）

转益多师，因此我对其他三位先生的治学特点的辨析似也略有把握：“王瑶先生是长期从事教学工作的著名教授、文学史家……他的治学特点是，具有文学史家的博观，善作纵向考察和横向联系，呈现甚深的历史感。又因为他常常结合教学实践，系统性、条贯性十分严密。”“陈涌先生不仅是鲁迅研究家，而且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家、批评家。作为理论家的特点在他的鲁迅研究中体现得很充分。这就是说，他不仅用理论来解决鲁迅研究中的许多课题，而且通过鲁迅研究，通过对鲁迅的思想或创作经验的概括，丰富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如果说，陈涌先生的著作，具有理论家的风范；那么，唐弢先生是一位具有散文家、Stylist 素养的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家。读他的著作，除了惊异于他的博览之外，还能深味他含英咀华的语言美。”（《鲁迅研究史上的丰硕成果——三本鲁迅专著的学习札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 年第 4 期）

我为了更新自己的知识，扩大自己的视野，调整和深化自己的思维方法，结合多年讲授“文学研究方法”，完成了《文艺学方法概论》这一代表性的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第二版时署《文艺学方法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为了结合我从 1990 年开始招收博士生的研究方向：“20 世纪中国文学史”，我主编了《20 世纪中国文学大典》三卷（上海教育出版

社,1994)。其时涉及鲁迅著作的专论写得较少。

自80年代开始,值得一提的几篇关于鲁迅的论文有:《鲁迅:中西文化冲突中的选择》,这篇论文曾在上海市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大会上宣读,继又提交北京召开的鲁迅与中外文化的国际学术会议。先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未定稿),又转载于《学术月刊》1986年第10期。我在这篇论文中指出:“如果说,鲁迅在文化选择上,早期有一种‘返顾旧乡’的寻根意识,中期还有一种由返激力所引动的急遽心态,那么,在后期,就显得从容周详,应付裕如,完满地体现了理性认知的主体意识。”“鲁迅从总结我们民族对外来文化择取的经验中获得了主体意识的历史内容,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拿来主义’不仅标志着民族文化意识的新觉醒,从而发出了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同步的呼声,还标志着半殖民地中国在西方文化冲突中被压抑的自轻心态的消失。”“鲁迅文化选择中的主体意识,在其实践过程中也有独特的表现,其一是文化比照中引申义的介入;其二是怀疑精神。”“鲁迅对文化深层意识的重建,不但成为他文学表现的主要内容,也有意识在这方面探寻。”总之,“鲁迅对外国文化的择取,总命题是希望中国人走向‘世界人’的行列。”此文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奖。

《论鲁迅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上海鲁迅研究》,学林出版社,1998)一文,代表了我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对鲁迅的独特观照,如认为:“在中国文学家中,鲁迅是最富有思想家的气质和特征的。由于鲁迅的思想常常通过文学的形式来表现的,为文名所掩,往往使人们容易忽视他作为思想家的一面。事实上,鲁迅即使不用文学形式而用理论形式来表述他的思想(例如他早期的论文便是如此),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突出地位也是不容置疑的。他是属于中国为数不多的最杰出的思想家之列的。”我认为:“鲁迅的理论是实践的产物而不是思辨的产物,这是作为思想家的鲁迅最可贵的特点。”“作为思想家,鲁迅的文章体现了‘社会批评’的特色。人生论虽然是中国哲学家的一个特点,但是,对普通人民思想情绪的研究常常排除在他们的视野之外。鲁迅在这方面的努力,正好填补了中国思想史上的空白。”“作为思想家,鲁迅还有一个特色。他思想里有一种‘野性’,即瞿秋白所说的因为他是吸了狼的奶汁长大而终于回到了狼的怀抱。……为此,他曾蒙上‘学匪’的恶谥。然而鲁迅正是以这种旧社会异化的精神杀回马枪的,从而他的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就大放异彩。”

《论鲁迅的智慧》一文,系为鲁迅诞生 110 周年而作,曾在《文汇报》、《鲁迅研究月刊》、《鲁迅研究年刊》多处发表和转载。它曾经是先期拟写的《鲁迅智慧论》一书的几个片段。这篇文章提出了这样一些观点:“鲁迅虽然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但他是一位具有高度的哲学思维的文学家。他的早年的几篇论文,都具有哲学意识,应该在近现代思想史上占一席重要地位。即如他晚年所写的《“题未定”草(六至九)》也完全可以算是一篇用文学形式写的哲学论文。《狂人日记》、《阿 Q 正传》,具有高度的哲理性,凝聚着他超人一等的智慧。”“首先,他对客观实在作了辩证性的理解。他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处于对立统一之中。自然界是‘榛枯弗剪,然而这才是深山大泽’。社会里的人际关系也一样,‘古今来无纯一不杂的君子群’。……客观实在既然是一种关系的辩证的反映,其本质的展开便是一切都处在相互联系之中。联系最基本的环节便是因果联系。而历史无不呈现出一种灼然可见的因果联系。”因此,鲁迅强调读史。“因果既是一种联系的关系,也是一种过程的展开”。因此,鲁迅自认为自己是历史的中间物,这正是一种参悟造化的智慧。

“鲁迅的智慧表现在实际斗争中具有一种高超的战略家的气度”。他所提倡的韧性战斗精神,“豪铤战”的战略,以及告诫青年:“站出来讲话尤需要明喻暗譬,大家领会而又无懈可击;绝不可以对当地当政强梁权贵指名道姓地明白指斥,借以避免授人以柄徒招祸害到自己身上。”都表现了他战略上的智慧。鲁迅更多地“将自己的理论思辨衍化在人生哲学之中,他从具体的社会心理入手,以此来把握人生哲学中种种规律性的现象,他在这方面所达到的惊人的智慧,至今还没有人超越。”例如他提出的一种“包围论”,认为“中国之所以永远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都是别具慧心的。

“鲁迅能从最普通的现象中提出关系到民族去取国家盛衰的命题。鲁迅的智慧和表现方式不是一种滔滔不绝长江大河般的水流,也不是一种娓娓动听令人赏心悦目的抒情的琴声,而是一种警句式的箴言,是一种动人心魄的启示录,即使像《野草》表现他的哲学思想的散文诗也是那样。这是一种独战者的智慧,一种具有超前意识因而不无孤独感的先觉者的智慧。”“毫无疑问,鲁迅表现在文学上的智慧也是过人的,他几乎开创了一切文学形式的新气象,而且每一篇作品都显示一种范式。”

为鲁迅逝世 60 周年所写的论文《二十世纪初期鲁迅的人文精神》(《浩

气千秋民族魂》，百家出版社，1998），就鲁迅在清王朝被迫变法，实行“新政”期间的施政方针所发表的意见，（第一反对“竞言武事”；第二反对“制造商估”，第三反对“立宪国会”）进行了重估，我认为：“既然对武备，振兴工商业，议会政治采取否定，因此鲁迅当时构想的以‘掇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为纲领的‘人国’，也就成为乌托邦式的空想。鲁迅期待着‘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也就变成一种诗意的浪漫主义。这是鲁迅接受了尼采和章太炎的误导，当然后来就很快摆脱了这种影响。”

鲁迅当时这些意见，在瞿秋白的权威性论文《〈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曾作为正面的反资本主义倾向而被颂扬，并被表述为一种经典性的结论。其实是他对鲁迅的一种误读。尽管据说鲁迅也赞成了瞿文的这种表述。我想我这篇文章如果有些价值的话，尽在于此。为了避免触目，我当时在文中并没有提出我与瞿文的不同意见。

鲁迅是万古凌霄的民族魂，但不是神。作为研究对象，后人应该对之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分析。鲁迅也有时代的局限。在斯大林执政的前苏联时代，高尔基曾发表了《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对当时的苏联领导层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批评，惊呼“良心死了”。而有“法国社会良心”之誉的罗曼·罗兰却发表了对斯大林歌功颂德的《莫斯科日记》，类似言论的还有德国的利翁·费希特；英国的肖伯纳，后者说：“俄国在闹饥荒？胡说。我在哪里也没有吃得像在莫斯科那么好。”鲁迅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中除了歌颂当时苏联的成就外，也说：“在现在，英国的萧，法国的罗兰，也都成为苏联的朋友了。”以及他写的《我们不再受骗了》等文，很显然也受了受骗者的骗，他当然不可能读到高尔基的被封杀的书。

有人认为，鲁迅的后期大大超越于前期，但后期的杂文政论性的较多，往往淡化了他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独立性和深刻性。当然，后期也有不少名文，为《“题未定”草（六至九）》，《买〈小学大全〉记》，《死》，《半夏小集》等等。我认为，不应该绝对地以前后期来定高下，延安《整风文献》所收的一篇思想性最强的名文，恰恰是前期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是整体的鲁迅。鲁迅也有不了解实情而出于激情的盲从。鲁迅研究的任务应该还鲁迅的本来面目。伟大人物毕竟伟大，因而毋须为贤者讳。

目录

我与鲁迅的因缘(代序)/1

小说论稿

序言/2

论鲁迅的思想特点和小说创作/3

论鲁迅小说与中国民主革命/19

论鲁迅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45

论鲁迅小说的艺术方法及其演变/64

论鲁迅小说的典型化/107

论鲁迅小说的艺术辩证法/141

论鲁迅小说的风格和语言/160

思想和艺术

论鲁迅初期美学思想/198

论鲁迅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217

论鲁迅的辩证法思想研究提纲/234

论鲁迅的智慧/272

论国民性问题在鲁迅思想中的地位/284
鲁迅：中西文化冲突中的选择/300
20 世纪初期鲁迅的人文精神/314
论“五四”时期的鲁迅思想/323
鲁迅：上海时期的社会思想/335
深层次地研究鲁迅思想/348
从方法论的角度谈鲁迅研究的创新/350
奇哉！鲁迅＝“老石头”说/353
鲁迅文艺理论旁探/355
论鲁迅的审美特点及其对创作的影响/367
《狂人日记》简论/383
《阿 Q 正传》简论/395
鲁迅小说中的劳动人民形象/404
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420
鲁迅小说中“我”的形象/443
论《故事新编》的独创性/449
略论鲁迅的诗歌/464
论鲁迅的抒情散文/467
鲁迅与拜伦/479
“别求新声于异邦”/489
鲁迅介绍外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498
鲁迅：跨文化对话/509

杂文导读

略论鲁迅杂文/516
《我之节烈观》/528
《随感录三十九》/532
《“圣武”》/535

《忽然想到(五至六)》/537	
《杂感》/540	
《论睁了眼看》/545	
《热风·题记》/549	
《十四年的“读经”》/555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560	
《华盖集·题记》/569	
《一点比喻》/573	
《无花的蔷薇之二》/576	
《纪念刘和珍君》/579	
《坟·题记》/584	
《写在〈坟〉后面》/588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594	
《小杂感》/599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602	
《“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607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610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614	
《“好政府主义”》/618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621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625	
《三闲集·序言》/631	
《二心集·序言》/636	
《为了忘却的纪念》/641	
《由中国女人的小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647	
《文摊秘诀十条》/651	
《〈杀错了人〉异议》/653	

《谈金圣叹》/658
《夜颂》/663
《智识过剩》/665
《伪自由书·后记》/667
《小品文的危机》/670
《捣鬼心传》/676
《准风月谈·后记》/679
《“京派”与“海派”》/684
《北人与南人》/686
《儒术》/688
《读几本书》/692
《拿来主义》/696
《运命》/699
《阿金》/702
《“招贴即扯”》/705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708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712
《论人言可畏》/716
《名人和名言》/721
《安贫乐道法》/724
《“题未定”草(六至九)》/726
《〈且介亭杂文〉·序言》/734
《死》/738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744